



内部资料  
妥善保管

# 理论学习

2018 年第 5 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宣传部

2018 年 5 月 10 日

---

## 目 录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七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汪洋出席并讲话 .....	1
“五一口号”·记忆.....	3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无党派人士 代表发言摘编.....	84

---

## 【编者按】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以开放的姿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制度、经验。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我们党从不自我封闭、夜郎自大，一直善于吸收最先进最有价值的时代营养。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是“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

7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7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此期特刊发“五一口号”专版，供全校师生更好回顾历史、珍惜当下、把握现在。

#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七十周年座谈会

## 在京举行 汪洋出席并讲话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张洋）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28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重要历史意义，认真总结70年来多党合作的重要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汪洋指出，7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7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汪洋强调，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勠力同心、团结奋斗，共同走过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多党合作事业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多党合作思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制度框架更加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影响更加广泛深远。实践证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智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汪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水平。要讲好中国多党合作故事，展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主持。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包信和在会上发言（发言摘编见第五版）。陈晓光、巴特尔、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等出席会议。

当天下午，汪洋参观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五一口号”·记忆1】“五一口号”初稿的起草

### 导读

当历史的脚步走到1948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经泾渭分明：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行将被推翻；共产党历来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而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

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在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的4月3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当时间推进到1948年上半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必然与偶然交汇的结果。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起草与正式发布，在时机成熟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比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为“五一”劳动节纪念分别发表《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1939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延安各界为此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

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是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

廖承志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青年时代，廖承志在孙中山、宋庆龄和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教育、影响下，积极投入大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国际工会派他赴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加入红军，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中共中央派他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历任中共南方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宣传部部长、新华社社长等职。廖承志天性活泼幽默，爱讲笑话、喜画漫画。如此出身，如此经历，如此性格，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的器重，在解放战争时期赋予了主管新华社、发布新闻之大权。

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想到的是请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随即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随即把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恰逢重大节日！于是，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起草“五一口号”。

当时的中共党内，既有像毛泽东、刘少奇式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乏像胡乔木式的理论功底厚实的理论工作者。因此，“五一口号”很快就起草完毕。

“五一口号”初稿一共24条，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方面的致敬和问候，包括：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向解放区努力生产的职工、工程师、技师、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们致敬！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推动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号召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职工和经济工作者以及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最终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而努力！口号的最后两条，即第 23 条是欢呼“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第 24 条是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2】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初稿进行了重要修改

“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他将目光停留在第 5 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着，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 23 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 24 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上。

毛泽东此时不免思绪万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救民于水火、追求人民民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主张“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反对一党一派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一政治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赞同，使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峥嵘岁月中，同各民主党派携手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革命胜利的曙光才刚刚显露，怎能提“万岁”呢？郭沫若先生所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不是被列为中共延安整风运动必读书目吗？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提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的诘问，共产党人不是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么？今天，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了。

也许是想到这些，或许想得更多更多，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 5 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着，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 23 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 24 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 23 条。

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1938 年，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题写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把“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1939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现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在革命胜利后还需不需要统一战线，还要不要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不仅在当时中共党内一些同志而且在一些民主人士心中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五一口号”第 5 条的修改提出，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3】“五一口号”的发布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以下是“五一口号”的全部内容：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解放区的职工，拿更多更好的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品供给前线！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更好的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

（七）向解放区努力生产军火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恢复工矿交通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改进技术的工程师、技师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努力后方勤务工作和后方机关工作的人员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工业部门和后方勤务部门的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

（八）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

（九）解放区的职工，为增加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减低工业品的成本而奋斗！拿更多更好的人民必需品供给市场！

（十）解放区的职工，发扬新的劳动态度，爱护工具，节省原料，遵守劳动纪律，反对一切怠惰、浪费和破坏行为，学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十一）解放区的职工，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建立尊师爱徒的师徒关系！

（十二）解放区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十三）解放区的职工会与民主政府合作，保障职工适当的生活水平，举办职工福利事业，克服职工的生活困难。

（十四）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

（十五）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致敬！欢迎蒋管区的职工到解放区来参加工业建设！

（十六）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不要替蒋介石匪徒制造和运输军用品！在解放军占领城市的时候，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

（十七）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十八）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

（十九）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压迫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职工运动！

（二十）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推动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拒运拒卸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援蒋物资的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并肩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致敬！

（二十一）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万岁！

（二十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

（二十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历史将永远铭记！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五一口号”发布的这一天，南京伪国大闭幕，总统、副总统就职。

一个政党围剿共产党、取缔民盟，迫使各民主党派领袖纷纷远避香港；一个政党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登高一呼，主动邀集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两相对照，谁独裁？谁民主？不言自明！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4】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5】各民主党派以各种方式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 导读

“五一口号”应时而生，一经见报，犹如一道耀眼的霞光划破长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此后，致公党、台盟、民进、民盟、农工党、民革、民建、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以此为标志，吹响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一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揭开了双方亲密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新篇章！

“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广泛影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更是群情激奋、热情高昂，他们通过多年的亲身经历，对比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着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决心，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真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共建新中国的决心。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当时，各民主党派还处于国统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和迫害，其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响应“五一口号”，自然不能在十分公开的场合进行。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以坚定的信念，采取不同的方式热烈响应，并对新政协会议召开的地点、时间和相关事宜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也传到了香港。香港是个自由港，也是个政治舞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抗日战争期间，白求恩等外国志愿者进内地支

援抗战经由香港，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保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往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也避难至此。

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土”，除国共两党外，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聚集于此。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经常聚会，谈论国家政局。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移居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重视这里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调潘汉年从上海局到香港分局。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后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当即决定改组特科领导，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特科工作，潘汉年任特科情报科科长，很快完成从文化人到情报人的转变，不久又实际负责特科的全部工作，显示出特有的情报工作能力。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周恩来就指定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潘汉年从此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指派陈云和潘汉年去白区传达会议精神，并设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的联络。几番传奇经历，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委托，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在完成谈判任务的同时，潘汉年还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与情报工作，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深得周恩来器重。

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工作委员会。他们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支持。

“双周座谈会”由各民主党派轮流主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4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有着中共背景 of 香港《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五一口号”，立即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虽然《香港时报》《大公报》《星岛日报》等视若无睹，但“五一口号”还是不胫而走。

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无党派民主人士情绪十分高涨，双周座谈会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两天，连续进行讨论，12位民主党派领袖积极发言。他们指出，“五一口号”最引起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重视和兴

奋的是第5条，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经过双周座谈会的激烈讨论，与会12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举马叙伦起草复电。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代表各自的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两电文说：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系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国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复活。吾国目前已等于美帝之附庸，全体同胞恐亦将为未来世界大战之牺牲品。同人等日深焦虑，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可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联名通电的 12 位民主人士中，有的出身行伍、身经百战，有的著作等身、堪称大家，还有的不爱红装、投身革命……在香港这个貌似平和实则险恶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时刻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

民革主席李济深，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先生本来选中这位粤军名将负责，后来又改为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

何香凝是 12 位领导人中的唯一女性。她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倚重。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被誉为“抗日名将”，他还领导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蒋介石的眼中钉。1946 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被迫迁到香港活动。他还经常出资支持香港的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郭沫若，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共产党立场一致，拒绝与会。郭沫若声望很高，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做协调工作。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沈老，个子不高、高额头、长胡须，他反对过袁世凯，反对过曹锟，反对过孙传芳……加入同盟会、发起救国会……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马叙伦，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曾担任上海数十个党派、团体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会主席。1945 年在上海领导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 年 6 月，马叙伦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

王绍鏊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积极参加讨袁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活动，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1947 年冬，他和马叙伦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安全抵达香港。

陈其尤，中国致公党领导人。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作为海外华侨代表

人物之一，为了革命，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46年初，致公党总部在香港恢复活动，陈其尤积极主张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带领着致公党这个早先支持国民党的民主党派投入反蒋阵营。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代理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李章达、彭泽民，分别参加过武昌起义、讨袁护法、南昌起义、福建事变……在大革命和抗战时期多为形形色色的反动独裁分子所不容。

这些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或曾神交已久，或曾并肩战斗，或与毛泽东等有数面之缘，甚至有的早期曾加入过共产党。此刻看到“五一口号”振奋人心的文字，他们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之心被凝聚到了一起！

一石激起千层浪！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一经发出，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5月间，民进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

民建因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未能列名参加联名通电。5月14日，民建成员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黄炎培的信，回到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陈述在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立场和行动。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理监事会，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等出席。经过讨论，通过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

6月9日，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

6月14日，民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

6月25日，民革经过多次充分讨论，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较晚。当时九三学社总社在国统区的北平，不便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北平解放前夕，九三学社于1949年1月26日公开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此外，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也发表声明，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民主党派 12 人联名响应和各民主党派通电响应，立即引起在港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反响。他们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致电、发表声明，热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

5 月 4 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

5 月 5 日，马来亚霹雳州侨团通电表示支持。

5 月间，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留香港理事郭沫若、马叙伦、陈其瑗、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宋云彬、狄白超、胡绳、千家驹、侯外庐等联名发表响应声明。

6 月 4 日，在港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柳亚子、沈雁冰、章乃器、胡愈之、朱蕴山等 125 人发表联合声明。

6 月间，留港的妇女界人士何香凝、刘王立明、于立群、李文宜、李健生、张曼筠等 232 人联名发表响应宣言。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6】各民主党派拥护共产党领导， 共同促进召开新政协

“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中央于5月7日致电中共华南分局，要求他们就召开新政协问题，同真诚反美反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知名人士交换意见。5月8日起，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在香港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各民主人士或召开大会、发表声明宣言，或激扬文字、鞭挞独裁政府，或游行示威、发动民主运动，或攻心策反、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一个以香港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讨论新政协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在发表的宣言以及相关文章中，都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5月23日，谭平山在《华商报》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其中指出，新政协领导的责任应“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说：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

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说，中国共产党应是新政协的“当然的领导者”。

致公党在《告海外侨胞书》中说：“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在一次有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说，我们应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承认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这一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民盟在《对于新政协共同施政纲领的意见》中指出：“新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的，除蒋介石独裁政权代表的地主、

官僚、买办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合作，所以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因此必须“确认新民主主义为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临时联合政府的最高施政原则。”

民进明确提出：“新建立之国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各阶级民主联合政权。”“民主联合政府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各阶级共同执政民主联合政权，但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指标。”“新民主主义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最高施政原则。”

显然，各民主党派不但承认新民主主义是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原则，而且他们这时的政治主张也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一致。

各民主党派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过程中，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彻底批判。

民革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中指出：“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民进在其宣言中，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中国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径可循进的。”

致公党在其宣言中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历史决定了独裁会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的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

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阴谋。

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表明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也表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力的步伐。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建

立之前的重要历史关头，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完成了民主党派历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转变，为民主党派带来了新生。从此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民主党派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中，号召民主党派广大成员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奋斗。

民革在声明中称赞“五一口号”“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号召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民盟在宣言中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以来，各方纷纷热烈响应；足见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主张，决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声明表示，“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时在上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张澜等致函沈钧儒，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并“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民建总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理监事会，经过讨论，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民进在宣言中指出：“‘五一’二十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以奠定我国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讨论了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一致认为新政协的地点应在解放区，召集人“当然由中共担任”，并建议“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提议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协的各项主张。后来这些主张在座谈会上得到了各党派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

农工党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中郑重声明：“本党全体同志，为促进

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之早日实现，应团结广大的群众进行战斗，与一切民主战友，携手前进”。

致公党在宣言中指出：“今天中国的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九三学社在北平《新民报》发表的宣言中指出：“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同人等认为唯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

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台湾人民才能由美蒋联合统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以促进新政协召开为中心内容，各种座谈会、演讲会，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也相继展开。6月4日，香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说：“我们愿意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热烈赞同”，“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民革声明要求：“在卖国独裁者控制下的各军事单位，各地方政府，各界团体的人士们：你们也应该深切反省过去附和或容忍卖国独裁的错误，谋所以救国家救人民及至救自己，也毅然接受孙先生的遗教和本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加速卖国独裁政权的灭亡，而站到人民方面来！站到民主革命阵营方面来！”

谭平山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中指出：新政协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确有群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

民盟在其宣言中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为本盟一贯的政治主张。不幸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醉心法西斯独裁，迷信武力统一，竟不惜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致令本盟及其他民主友党的主张，暂时遭受了挫折。”“时至今日，独裁统治的行将倾覆，中国人民的民主胜利，已经成了定

局。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没有人再会怀疑的了。”

民盟的总部机关刊物——《光明报》，广泛开展对新政协的性质、特点及任务的讨论，向广大读者宣传新政协与旧政协的不同，在于新政协代表人民意志，不要代表地主买办豪门资本的反动独裁集团参加，不要美帝国主义过问；新政协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新政协应由中国共产党来召集，明确提出革命领导权问题。

民进在宣言中将新旧政协作了区分，指出：“我们不要把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和过去的政协混淆了意义，旧的反动者的政协，已经因他们撕破而过去了，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

5月中旬，马叙伦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做了深入的比较。马叙伦指出：“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

从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宣言中可以看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当时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意愿，真可谓中共产臂一呼，海内应者云集。

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权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北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新中国在那里喷薄欲出……

北方！南国香港遥望北方，人们迫切期盼西柏坡的消息……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7】中共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 导读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之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南方。上海，远东最繁华的都市，居住着宋庆龄、张澜等著名民主人士；香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成为民主人士的政治避难所。

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潘汉年、方方、连贯、夏衍等人，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的眼线，成功地护送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一路向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豪情满怀，逸兴横飞……

然而，国内局势，风波诡谲，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并非易事。冯玉祥将军从美国经苏联回国，在黑海因轮船失火不幸罹难；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民盟成员黄竞武牺牲在共和国诞生的前夜……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民党在溃败之际，大肆迫害民主人士，却再也挡不住大厦将倾的命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已喷薄而出！

1948 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陆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这时开始，筹备新政协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戮力进行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筹备新政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在解放区以外，尤其是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时地护送到解放区。从 1948 年秋开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主要由中共中央华南局和香港工委具体负责，开始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1948 年中共中央作出护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决定时，考虑到所有解放区只有东北条件稍好，还有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华北解

放区尽管条件一般，但在地理上靠近平津。因此，当时确定接待民主人士的主要地点有两个：一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二是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村，即中共中央城工部（1948年9月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当时其首要工作任务就是进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组织、护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到解放区，进行联络和接待工作）所在地。

1948年9月，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上海局的电文中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当时考虑召开的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共180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为此，中央还不惜本钱，在东柏坡建立起了当时中央机关最大的房子——政协礼堂，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使新政协最终在北平举行。

1948年5月2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电文明确：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会议的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为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的人民团体。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间拟在今年秋季。为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要他们收到电文后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范围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9月20日，周恩来又亲自拟定了包括中共中央5月2日电文名单在内的港沪和长江以南各位民主人士的77人名单、平津各位民主人士的24人名单，并分别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华北局、华北城工委，征询对名单的意见。

11月5日，周恩来又致电香港分局，责成分局和钱之光等在12月内将尚在香港和上海的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炯伯、陈嘉庚等准备参加政协的几十名各方面代表护送到解放区，并

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周密布置。

12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潘汉年、钱之光，明确：在香港列名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新政协，并希望即分别与民革、救国会、第三党（即农工党）及致公党接洽，推出代表，并设法护送他们到解放区来。

为作好民主人士的护送工作，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负责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钱之光长期在国统区的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工作，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早在1947年夏天，他就奉周恩来之命去大连，建立了中华贸易公司，租用外国船只，以贩运物资为掩护，往来于大连、香港之间，开辟通途。接电后，钱之光即刻衔命南赴香港。当时，随同钱之光赴港的还有杨琳、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8月9日，周恩来又致电方方并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随后，方方、潘汉年等和赶到香港的钱之光开始着手进行紧张而又有序的准备。很快，一个以潘汉年、许涤新、饶彰风、夏衍、乔冠华等为主要成员的专门小组成立，其中潘汉年、许涤新负责筹集经费（主要用于租船），夏衍、乔冠华分管联络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饶彰风则带领杨奇、杜宣、赵枫、陈紫秋等负责具体事宜，并设立了专门电台随时与中共中央、大连方面保持直接联系。同时还把设在香港的“联合公司”改组扩大为“华润贸易公司”，钱之光任董事长，以更好地掩护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华”即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毛泽东字润之的润，代表中共。

当时，香港的政治气候已日益恶化，中共在港活动不时受到港英当局的骚扰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陆上交通极不安全；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这又要冒着港英政府阻挠、破坏和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的风险。因此，要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顺利到达解放区，任务十分艰巨。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亲自策划北上路线、安排交通工具及护送人员，并曾设想开辟从香港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国际路线，但因港英政府的阻挠

而未能在短时间内打通。最后，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决定租用外国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周恩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护送过程中的安全。1948年8月30日，周恩来获知中共香港分局的首批接送工作已准备就绪，遂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致电钱之光，提醒“须注意绝对保密”。一周后的9月7日，周恩来获知冯玉祥将军乘苏联客轮由美归国途中于9月1日在黑海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即刻致电潘汉年并中共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就拟议中的宋庆龄由上海经香港北上事，周恩来也曾专门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为切实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人遵照周恩来的要求，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他们还对如何分批行动，每次租哪个国家的船，上船经过哪条路线以及沿途由谁护送等，都作了严密而巧妙的安排。据钱之光后来回忆：“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们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也做了调查了解，熟悉经过地段的情况，还事先约好从哪条路走，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等。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我还另派工作同志随船护送。”“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我们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等来决定的。”“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动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人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上船后，还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在外面的人，“有

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装，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大家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安全工作，才保证了护送工作的顺利进行。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8】北上，北上

从1948年8月起，在中国革命胜利形势激励下，在中国共产党诚挚态度、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远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了到解放区去的征程。整个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工作，前后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大致分北线和南线分批分次进行。

北线主要是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具体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李家庄。他们大多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和平教会的交通站到泊镇办事处，再到达李家庄；另一条是从上海或香港经山东解放区到李家庄。

1948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即开始组织北平民主人士到李家庄。当时，这些民主人士从平津沪等国统区大城市前往解放区，路途虽没有香港那么遥远，但同样要冒很大的风险。为此，中共地下党做了周密的安排，确保了护送工作的顺利成功进行。到9月底，从北平、上海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等。到1949年1月中旬，又陆续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严景耀、沈兹九、王蕴和、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等。其中费孝通、张东荪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是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平西郊八大处乘坐大卡车出发，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到西柏坡。这些民主人士到达李家庄后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南线主要是把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东北解放区，该线路人数最多，也最艰巨。为了安全、保密、不引人注目地护送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还在丹东、大连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接待安排，并护送到哈尔滨，最终分四批成功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东北解放区。

第一批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等十几人，由中共派章汉夫陪同，于9月12日晚在香港登上苏联“波尔塔瓦号”轮船，13日正式离港启航，经台湾海峡北上，经过艰难的航程，于9月27日到达朝鲜的罗津港。据钱之光回忆：船在经过台湾海峡时遇到了强台风，失去了控制，被冲到澎湖列岛附近，经过全体船员的努力，才摆脱了触礁的危险。当时在船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仍镇定自若，有的还和往常一样，做着健身操。

中共中央对首批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非常重视，周恩来于9月18日专门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往迎接（两天后，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建议，决定改派离罗津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前往迎接）。第一批民主人士在罗津登岸稍事休息后，即乘火车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入住东北行政委员会招待所（原马迪尔宾馆），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人的欢迎。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又联名致电沈钧儒一行，对他们这次北上的安全抵达表示慰问和欢迎。

第一批民主人士顺利离港到达解放区，使钱之光等备受鼓舞，拟定第二批民主人士在10月中旬出发。不料，所租的苏联船只到香港时与一艘货轮碰撞损坏，需要一段时间修理，后来租了一艘挪威货轮，10月底第二批民主人士乘坐悬挂有挪威国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这一批民主人士主要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携子周海婴）、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由连贯陪同，胡绳随行。11月中旬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抛锚下人，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负责同志前往迎接。此时得知沈阳已解放，于是改乘火车经丹东于12月6日到达沈阳。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主要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由李嘉仁陪同，加上中共随行人员共30多人。周恩来事前给大连的冯铨、刘昂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还特地嘱咐，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随后，周恩来特地电示钱之光：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并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八字原则。果然，国民党特务发现不少民主人士已不再露面后，加紧了监控，香港方面更加关注华润公司，连政治部的负责人都以谈业务为名来过华润公司，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为保险起见，钱之光把该批民主人士离港时间定在圣诞节的后一天，利用香港放假狂欢之机行动。12月26日，要走的民主人士先各自离家，或去亲友处，或去旅馆开个房间，然后分别由交通员送到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上。

李济深是各方瞩目的人物，中共与他有密切联系，香港当局和他经常往来，美国方面也频繁接触。在国民党军事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一些人对李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到那里你就身不由己。一些人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谋划“划江而治”，白崇禧曾写信给李济深，让一位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请李济深回武汉“主持大计”。情况错综复杂，李济深要想离开香港，确实困难重重。为此，何香凝在一次聚会后对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为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等对李济深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并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同北上。

为迷惑外界，李济深先参加一个午宴，由何香凝等作陪，宴毕，他与朱蕴山等带着酒肴，坐上交通员掌舵的游艇，装作去海上游览，在水面上游弋。入夜以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阿尔丹”号，并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夏衍后来回忆，当时他们十分紧张地“在一家旅馆守着一部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

1949年1月1日，有记者就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去采访李济深，才发现人去楼空。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亲自找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么交代？”于是岛内谣言纷起，直到1月4日，美联社播发了一条可靠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据说……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以前北上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而此时李济深等已过了台湾海峡了。

经过10多个昼夜的艰难航行，“阿尔丹”号在途中损坏了一个引擎，但仍于1949年1月7日安抵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等专程前去迎接，同时还邀请已在解放区的朱学范一同前往。



李济深等登岸后，被安排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饭店（大连当时是苏军管区）。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关东酒楼设宴为李济深等接风洗尘。因为当时天气很冷，周恩来还安排送去了皮帽、皮靴、貉绒大衣等御寒用品。李济深等颇受感动，连声称道：“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名符其实雪中送炭！”随后李济深等便在中共安排下于1月10日到达沈阳，与先期到达的沈钧儒、马叙伦等会合，一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第三批民主人士成功北上后，由于美联社播发的“可靠消息”，香港气氛变得愈加紧张起来，港英当局加紧了对进出港水陆交通的控制，国民党特务更是盯梢、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故直到1949年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才得以离港北上。该批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及其子盛康年、姚维钧、俞寰澄等，由刘恕护送。由于天津已经解放，所以船到天津他们便上岸，并于3月25日直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车站迎接。

除以上众所周知的四批外，当时经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很多批。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马寅初、王芸生、沈体兰、郑振铎、刘尊棋、傅彬然、陈叔通、包达三、张志让、宋云彬、徐铸成、赵超构、吴全衡和柳亚子夫妇、曹禺夫妇等共27人，乘坐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由香港北上，3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3月18日到达北平。

紧接着，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伦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贤、张文元、陈迺冬、傅天仇、林砺儒、薛迪畅以及香港达德学院部分师生和华侨（在中共广东区委和香港的民主人士的努力下，达德学院于1946年10月在香港成立。学院设立了董事会，李济深为董事长，杨伯恺为秘书长，蔡廷锴、丘哲、张文等23人为董事，聘请曾任广州国民大学校长的陈其瑗担任学院院长。达德学院以“研究高深的学术养成为人民服务之爱国人才”为宗旨。1949年2月23日，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政府下令撤消注册，被迫停办。此时学院领导与教员已经离港北上解放区。达德学院在存在的两年半时间内，共招收三届学生，培养近千人。学生毕业后大都陆续到粤赣湘等游击区和华北、华中游击区以及解放区，参加解放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于1949年3月20日由冯乃超、狄超白、周而复、阳翰笙、黄药眠、胡一声等陪同，乘坐“宝通号”外轮北上，3月27日到达天津，随后转赴北平。

此外，规模较小的还有：1948年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1948年12月，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康达、林植夫、卢于道等北上。1949年2月，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吴羹梅、杨美真等北上。1949年3月，何香凝、廖梦醒母女、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等北上。

在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过程中，还有过其他方面的计划和努力。比如，1948年秋，潘汉年曾找到萨空了商谈，请他与港方当局交涉，希望开辟一条经欧洲进入解放区的途径。萨空了找到香港大学校长施洛斯（D.T.Sloos），说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等要从香港去伦敦，再经苏联到达东北解放区。施洛斯将此事报告港督，港督再将此事报告伦敦。直到12月，伦敦方面才传来意见，说不能发护照，但可以给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的时候，还可以保护。由于此时第三批民主人士已离港北上，遂没有再走欧洲路线。

除众所周知的北线、南线外，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如朱学范、张澜、宋庆龄，以及华侨代表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则是通过其他路线到达解放区的。

1947年底，朱学范从香港到巴黎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又到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出席会议的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转达了中共中央请朱学范去解放区的邀请。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在刘宁一的陪同下，经布拉格、莫斯科，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是较早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

1949年5月初，在上海的张澜等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拘禁起来，直到5月底上海解放，张、罗才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营救幸免于难，并于6月24日和史良、郭春涛、王葆真等一起由上海抵达北平，受到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及在北平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人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毛泽东特别重视盛邀孙中山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电文，心绪难以平静。2月20日，她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的。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不久的将来光荣地完成。”此时，中共中央

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传阅了宋庆龄致中共中央的复信。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6月19日，毛泽东再次亲笔致函宋庆龄，诚邀其北上，信中说：“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并让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这一信函专程前往上海，面呈宋庆龄。21日，当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中写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6月28日，邓颖超携信专赴上海，面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无限诚意，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乘专列离沪北上。28日安抵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及李济深、何香凝等亲自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团结海外华侨的力量。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南洋侨领陈嘉庚：“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同时致电大洋彼岸的致公党元老、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陈嘉庚、司徒美堂这两位在海外享有声望的华侨领袖，接电后都铭感毛泽东的盛意，毅然归国赴会。陈嘉庚于1949年5月5日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北上回国，6月3日到达天津大沽口，4日到达北平。司徒美堂也远涉重洋，于1949年9月4日到达北平。

在护送每一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过程中，中共的同志都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使北上的旅途上充满了欢愉的气氛，大家纷纷用诗文抒发自己对这次“光明行”的真诚歌颂。

当彭泽民得以重返久别 20 余年的故土和解放区时，获得解放、自由后的喜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赋诗写道：“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

柳亚子在北上途中赋诗云：“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李济深则于 1949 年元旦在船上为同行的茅盾即兴题词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同船的朱蕴山在途中也吟诗多首，其中有“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含义深长的佳句。

郭沫若在船上更是办起了《波浪壁报》，刊载胜利消息，并赋诗云：“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

到 1949 年 3 月，整个接送工作基本完成，经香港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科学家、作家及部分家属等共计 350 人以上。周恩来称赞钱之光等：“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了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1949 年 1 月 16 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到李家庄看望大家，并向他们通报了解放战争的进展和新政协的筹备情况。

1 月 20 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平山县李家庄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由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到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代表华北人民对刚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民盟中央委员韩兆鹗等代表主客双方致辞。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政务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为参加新政协而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致欢迎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等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并宣读了

施复亮、孙起孟的书面发言，表明了到解放区的感受及参加建国工作的决心，并一致痛斥南京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的阴谋，一致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李富春讲话。他说，今天的欢迎会，象征着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象征着全国胜利的快要到来。

中国共产党将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邀请护送到解放区，体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政治胸怀。这数百位民主人士大多是“旗帜性人物”，对他们所联系的各社会界别的人们，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拥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基本群众。把全国各方面的民主力量都融汇在一起，就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性质，它以雄辩的力量昭告天下：新政治协商会议从本质上区别于 1946 年国民党召集的旧政协，由此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毋庸置疑将获得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9】不同的信念，不同的选择

在民主建国的进程中，有很多民主人士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倒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他们将永远被人民、被历史所铭记。同时，也有党派及其领导人把握不住历史潮流，走上了一条背离民主、脱离人民的不归路。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远在海外的冯玉祥将军感到无比振奋，他决心响应中共号召，回到祖国出席新政协会议，参加新中国的建国工作。

1946年9月，冯玉祥将军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被迫以考察水利为名远走美国。赴美之后，他通过发表演讲、召开记者招待会、撰写文章等手段，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和反动统治，特别是在反对美帝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政策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47年秋冬，他参与发起和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民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一口号”发布后，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7月30、31日先后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于7月31日携全家登上苏联“胜利号”邮轮，准备经苏联转道回国。船行一月，在黑海航行途中，因轮船突然失火，抢救不及，于1948年9月1日不幸遇难，终年66岁。这位为新中国早日诞生而奋斗的老将军，牺牲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专电冯玉祥将军的家属，表示痛悼，称誉冯将军“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1949年9月1日，在解放了的国土上，在新政协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在北平举行了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等，致送了挽联、花圈和挽词，并将其遗骨安葬泰山。名山忠骨，千秋生辉。

1949年9月19日，民革中央执委、民联中常委、民革和民联西南地区负责人杨杰由昆明到香港，准备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之际，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

杨杰，字耿光，又名漱石，1889年生于云南省大理县。191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队伍，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随军北伐。此后历任师长、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长江要塞总司令、陆军大学校长等职。

杨杰原是蒋介石亲信，深得蒋介石信任。后来随着蒋介石反动本质的逐步暴露，杨杰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亲美反苏愈加不满，常常公开加以指责。1945年10月，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发动民主人士投入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去，成了一位不屈不挠的反蒋斗士。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合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民革西南执行部，并秘密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随着形势的发展，杨杰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危非常重视和关心，1949年下半年，潘汉年即劝告他迅速离滇赴港，然后转程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杨杰考虑到他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此时离开，怕前功尽弃，产生不良后果，即托人转告中共中央，容他暂缓一步离滇。然而，令他没有估计到的是，不久云南风声骤紧，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原来此前卢汉应蒋介石之命到重庆面谈，本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争取起义时间。但实际上，卢汉答应了蒋介石一些反共反人民的条件，回来后于9月9日晚搞了一个“九九整肃”的大逮捕，共抓捕昆明进步人士400多人（后又全部释放）。事先蒋介石曾当面命令卢汉逮捕杨杰，卢汉回昆明后即通知杨杰尽快离昆。9月9日上午，杨杰秘密飞往香港避难，入住湾仔轩尼诗道302号友人李寓所。

杨杰逃离昆明后，国民党军统头子毛人凤亲自将从杨杰家中抄出的日记及往来信件等一一翻阅，终于掌握了杨杰在香港下榻处，随即布置了谋杀计划。9月19日晚10时左右，国民党特务偷偷来到杨杰住处，谎称有要信面呈，杨杰毫无戒心地取过信，坐在藤椅上拆阅，特务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杨杰胸部就是一枪，紧接着又对其头部补了一枪。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就这样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在解放的前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杰被害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进步爱国人士对于国民党特务躲在阴暗角落里所干的卑鄙勾当表示强烈的义愤。国内外许多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卑鄙行为，深切悼念杨杰将军。在杨杰将军的追悼会上，新华

社的挽联是：“蒋死党水尽山穷，敌对人民屠俊彦；新中国千锤百炼，清除汉贼慰将军。”民革中央电唁杨杰将军家属：“惊悉耿光同志应召出席人民政协会议，途中在香港惨遭匪特杀害，不胜痛悼！耿光同志致力民主革命，贡献甚多，当此新中国正在诞生，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之日，耿光同志虽死，亦无可憾。尚望勉抑哀思，继承遗志。特电奉唁。”

杨杰遇害后的第三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在北平正式召开。在庄严而隆重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家属致唁，并特许杨杰为列名缺席代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将军为革命烈士。

1949年5月18日，民建上海“临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竞武因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到台湾而被杀害。

黄竞武，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为黄炎培先生次子。早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在盐务机关服务，对中国盐务会计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许多贡献。黄竞武在民主政团时期即加入民盟。当时在重庆，曾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和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1945年12月初，民盟中央委员沈志远和黄竞武前往上海筹组民盟上海市组织，次年2月20日宣布组成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黄竞武被推定为筹备委员，并与沈志远同为筹委会召集人。8月，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黄竞武被选为执行委员。1947年5月2日，民盟上海市支部进行改组，黄竞武仍被选为执行委员。

黄竞武对国民党早有本质上的认识，也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那时黄竞武在上海成天忙于搜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有关组织、业务和人事方面的资料，监视国民党把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偷运台湾的活动，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并和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为国民党特务所侦悉。

1949年5月12日这天早上，黄竞武和夫人一起坐着车来到位于外滩的中央银行办公，似乎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然而，一个陌生的面孔来到了黄竞武的办公室，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起来。陌生面孔说中央银行行长要召见黄竞武，把他骗到楼下。随后，他被押上预先准备好的警备车，蒙上眼睛，送到秘密机关



拘留起来。原来，那个陌生人即是毛森指挥下的保密局特务。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黄竞武始终严守秘密，坚贞不屈。5月18日深夜，黄竞武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上海解放后，黄竞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和中苏文化协会干事罗志（汉族）等五人，1948年8月27日在转道苏联阿拉木图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为此，毛泽东发表唁电，深表哀悼。

除了上述人物外，为参加新政协、创立新中国而牺牲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很多，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主建国的信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浪淘沙，多少风流人物，多少社团党派，在历史长河中，有的顶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有的折戟沉沙，终成过眼烟云。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党派，然而，由于他们不能顺历史大潮而动，最终落得偏居一隅、苟安台湾的结局。历史是无情的，同时也是最公正的。

中国青年党1923年12月成立于法国巴黎，称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9年改为“中国青年党”，信奉国家主义，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和国家至上论，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4年秋返国，从事反共活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青年党在反共的同时，也曾开展过以“民治”为内容的改良主义活动，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七七事变后，青年党参加抗战，开始同情、接近中共，并附和抗日民主运动，还参加了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属于民主同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更曾一度把持盟务，因一直坚持右倾立场，属于民盟内部的右翼。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决定了新的党纲与党章，在中央人事安排上进行了改选，到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以曾琦为首的右派力量彻底控制了对青年党的领导，并在是否参加伪国大问题上，使青年党最终从民盟中决裂而去。许多青年党党员为了获取高官厚禄，争相投入国民党政府当中。曾琦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总统资政等职，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常燕生等任国民政府委员。此外，还有数十人任立法委员、国民参议员、宪政实施促进会委员。国民党假意开放政权，青年党人趋之若鹜。

对此，当时的《华商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想拉拢一二无重要热衷权位的小党派，作为‘民主’的伪装，以欺骗国际视听，其目的无非是要骗取美帝国主义的借款，以进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并巩固其独裁政权。”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并开始了大反攻。在国民党强弩之末时，蒋介石为了粉饰太平，下令于1948年春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青年党依然是积极参加者。他们先是发表了《青年党参加行宪国大声明》，表示“参加国大实大义所当然”，宣布青年党“参加国大，以襄盛举”。大会期间，青年党出席的代表共230人，其中60人参加立委，11人参加监委。3月，行宪首届行政院成立，青年党推陈启天、左舜生、刘静等人为政务，并由陈启天任工商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时至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退逃台湾时，青年党最终也没有觉悟，随从国民党赴台湾。从此，青年党在台湾也就成为国民党点缀门面的花瓶，历史的发展使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党派最终走向了没落。

如果说青年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还算是“稳健而行”的话，民社党则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并不稳健，因为，它每走向国民党一步，都要伴随着自身组织上的一次分裂。民社党属战后中国的第三方势力，其前身为成立于1931年10月的中国国家社会党。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海外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从国家社会党到民主社会党，名称虽有变化，主张基本相同，均以反对国民党专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的。1947年7月，民社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张君勱为党主席。

民社党走向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一步是在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期间。抗战胜利后，民社党参与发起组成民盟，并成为其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国民党很快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并单方面宣布召集“国民大会”，这无异于昭示国人，国民党绝不肯放弃专制。民社党失望、不满的同时，又面临着政治上何去何从的抉择。开始时，张君勱代表民社党在民盟内部多次声明要坚守政协决议，不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不久他又禁不住国民党的拉拢，不顾民社党其他主要人物张东荪等人的反对，竟于1946年11月20日上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11月23日，他又向国民党提交了民社党参加本次“国民大会”的40名名单，公开投靠国民党。这个表面看来似乎突然的转变，实则是一些幕后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因，民社党不仅在政纲、立场上与国民党有相近或共同之处，

背后还有功利主义的驱使。为此，民盟于12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违反盟纪，决定凡盟内民社党成员参加“国民大会”者一律开除盟籍。在民盟及广大民主正义力量的指责声中，民社党内部也随之产生了矛盾。张东荪、孙宝毅、叶笃义等民社党内较有影响的一批人因不同意参加“国民大会”，宣布退出了民社党，继续留在民盟内。民社党随后又于194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行宪国大。民社党发表声明称誉此次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公开表示“本党为维护宪法之尊严，为保持国家之基本，绝对同情蒋主席在国大开幕词反对修改宪法之主张”，“本党愿竭绵薄之力，掬诚挚之心以助其成功。”民社党在政治上彻底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其掩盖国民党专政、粉饰民主、欺骗舆论的御用工具。到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退逃台湾时，民社党也随之而去。

同青年党一样，民社党在侧居台湾之际也成了国民党的一个政治花瓶。

张君勱从1949年离开大陆后不久，即将党务委托他人，自己长期漂泊海外，直到1969年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仅于1950年到过台湾一天，个中隐情、滋味唯有自知。左舜生后来只得把随波逐流、身不由己的痛苦寄托在诗文之中。他曾写道：“软水温山，丹枫白露，海舟点点神州路，谁言游子竟忘归？归帆总被秋风误。浊酒休停，闲愁休诉，欢娱共把颓颜驻。从头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错。”也许张君勱、左舜生等一千人到最后真的感到自己这一生是走错了，却已悔之晚矣。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10】揭穿美帝和国民党政府 “和平攻势”的实质

### 导读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已是内外交困，人心尽失，四面楚歌。蒋介石无奈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美国也希望在中国扶植新势力，策动所谓“民主自由主义者”，组织“新第三方面”来维护其在华利益。然而，此时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已不会再为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攻势”所迷惑。他们纷纷发表声明，痛斥和回击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坚定地站在了革命和进步的一边。

当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国民党已退守台湾。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搏杀又两度合作的政党，淡出了历史舞台，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一湾浅浅的海峡，涛声阵阵……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进行参观学习，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各项方针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决战拉开了序幕。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以组织起系统的防御，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美国为了扶持国民党行将全面崩溃的统治，变换了对华政策，一是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企图通过划江而治保存南京政府以便卷土重来。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培植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美国及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为此，美国一方面策动国民党政府“换马”，逼迫蒋介石让位给“李宗仁或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另一方面策动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组成

“新第三方面”势力出面，希望他们“将能在政府和国内对改革发展力量，足以使人有共产党席卷之势的扩张还有被遏制和扭转的希望。”

内外交困的情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能做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其“个人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但是，蒋介石在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公开提出了五个前提条件，即所谓：（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三）宪法不由我违反，宪政不因此而受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五）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标准。蒋宣称：如此等条件不能达到，国民党“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

显然，这是貌似公允、实属是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这时，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寄予希望。他们害怕革命进一步发展会损害自身的阶级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人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一些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裂土自保。

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卷土重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惨痛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全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模糊和动摇，毛泽东强调指出：“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等一系列批判文章。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鄂、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严正指出：“养痍遗患、莠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薰莠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绝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过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

1949年1月22日，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确是快要土崩瓦解了”，“乃改变花样”，他们的反动目的，“一面，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酝酿反对派组织，希望阻止或缓和革命的步骤；一面，则唆使南京反动集团发动和平攻势，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因此，“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和调和之可能”，“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在我们人民民主阵线内，更必须提高我们的警惕，整肃我们的阵容，齐一我们的步伐”，“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他们针对那些动摇者指出，“在少数人的气质中也尽有这样的弱点存在，以协调为上德，以姑息为宽仁，在苟且偷安的本质上演着悲天悯人的外表，这就是敌人施行和平攻势的最后心理根据，也就是敌人最大的奥援。我们为摧毁残敌，这最后的奥援

也是应该连根铲去的。”同时，他们又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之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1月27日，民革在东北解放区沈阳单独发表《对时局声明》，指出：“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致重蹈辛亥革命失败之覆辙”；“没有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而又包容有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和平，是伪装的和平，反民主的和平，不彻底的和平！”所以，“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目标的贯彻，又是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实现的前提”；“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国民党反动集团“要求与中共进行和谈，装出十足欺骗人民的姿态，都是在美帝指使之下的反革命阴谋的公开表演”；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

1月10日，民盟发表《申斥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指出，蒋介石的“一连串的和平攻势，即所谓‘以和养战’的政策”的反动目的是“企图利用这个和平攻势来和缓人民武装的进攻，和缓蒋区人民的怨愤，借以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新组织反动的武装力量，以延长战争的祸害”。国民党是人民公敌，迫害民主同盟的祸首，“因此我们和他们中间绝无‘和平’谈判的可能。他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及早放下武器，迅速无条件投降”。申明“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所需要的是永久真正的和平，而不是和反动派妥协的和平，事实上是延长战祸的和平”。1月20日、21日，民盟又连续发表《响应毛泽东主席八项和谈主张》和《对和平的态度》，坚决支持中共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指出，我们一向主张“彻底的和平，民主的和平，具体地说，也就是以今天毛先生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

1月22日，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其中就有民建领导人章乃器、孙起孟。他们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和平”阴谋。

1月22日，民进发表宣言，着重指出了美蒋和平攻势的毒计，“是想把伪民主革命分子混入我们阵营里做捣乱和破坏的工作”。因此，民主势力必须在反对三大敌人的目标下，“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决不使我们阵营里有一个反动分子可以立脚，给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或是想象中间路线的口号和主

张。”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在解放区致电上海、北平、香港诸会员，通报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民进对于“和平”的态度，指示各地会员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并指出：“吾人须知，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盖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划界，绝无调和之可能。”

1月25日，农工党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毛泽东先生1月14日的《时局声明》严正地揭破了蒋介石等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建议”，“代表了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一致的要求，唯有这八项条件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毛先生的号召，也即是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

1月28日，致公党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宣言，指出“现时蒋介石战犯集团，土崩瓦解，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此种愚妄阴谋，不攻自破。唯中国历次革命，对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大任务，未能彻底执行，致国家乃沦于半殖民地地位。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的和平。”

九三学社许德珩1月26日发表对全面和平的意见，指出：“基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以及豪门资本的种种势力，造成多年来全国人民遭受压迫的反动统治，这些势力一日不彻底清除，真正的和平就一日不能实现，民主进步的中国也无以建立。”

台盟于1月17日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同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的任何一项都不得缺少，也不许作任何的妥协或让步。反动派正在装模作样地号叫和平，这完全是欺骗的苦肉计。”

各民主党派对毛泽东声明的一致热烈响应和拥护，昭示了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彻底揭穿美帝和国民党政府“和平阴谋”，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共同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11】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向 全国进军

各民主党派不仅在政治上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而且还发挥各自的优势，竭己之所有，尽己之所能，领导广大成员开展组织武装、策反起义、收集情报等活动，以实际行动不懈参与、全力支持这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配合解放军作战，从 1948 年初起，民革、民盟、农工党等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区建立起不同规模的数十支反蒋武装，每支少则一二百人，多的达四五百人。这些反蒋武装或发动群众为解放军筹粮筹草、修桥修路、介绍当地情况，或直接配合解放军进行战斗，消灭敌人等，作出了很大贡献。

民革成立后，李济深、龙云指令滇军旧部万保邦到迤南，由杨杰协助建立滇黔人民自卫军。1949 年 2 月，自卫军发动了攻击蒙自的武装起义，散发《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和《告云南民众书》，极大鼓舞了西南人民的反蒋斗争。不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起义军全部转入地下打游击，后编入中国共产党滇桂边区纵队。民革还在四川建立了地下民革民主联军，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司令员王蕴兹、川南军区司令员李宗煌、川北军区司令员蹇幼樵及若干民主联军司令员在各地筹集武装起义力量。王蕴兹曾在家乡利用其担任崇宁县参议长的“合法”身份，组织了 1000 多人的队伍，发动起义，因众寡悬殊，起义未获成功。王蕴兹最后收容了 100 余人到西康雅安地区，在刘文辉掩护下，经整顿保住了实力。1949 年 12 月下旬由雅安出发，在成雅公路上配合人民解放军，围击国民党溃逃部队于邛崃县附近，受到解放军领导的赞扬。

1948 年下半年，民盟江西省临时支部分别在武功山、修水、武宁、宜春、都昌等地建立了革命武装，配合中共解放了一些县城。民盟四川省支部也在雅安地区组织了游击队。此外，民盟还在安徽合肥地区策动地方团队起义，成立了合肥支队。

1948年9月，农工党中央扩大会议向全党发出号召，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在武装斗争中尊重中共战友，在其统一指挥下巩固合作。”农工党在江西九江、德安等18个县、区建立了由4500多人组成的、3000多支枪装备的部队，解放了修水、九江县城，全歼九江县的国民党武装，活捉县长和警察局局长；在湘西建立了“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共3000余人，在中共萧劲光、曹里槐的直接指挥下，在解放军一一三师、一一七师的帮助合作下，同国民党军队经大小战役十余次，解放了湘西各县；在广东有五支游击队，共有人枪2600余，与中共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到广东解放，农工党员黄桐华还被中共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区先遣支队司令员”；在广西组织了百余人的“富川游击队”，进行抗兵抗粮斗争；在浙江省，在中共金萧支队、浙东第六支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农工党人组织了游击武装约300人，与当地中共游击队协同作战；在四川，农工党人建立川北农民自卫军，与当地反动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瓦解逃窜的国民党二警总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缴获步枪千余只、大炮10门，此外还有大批军用物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民革、民盟、农工党的许多领导人和成员，由于过去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同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将领有着各种联系。为了瓦解国民党军队，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他们在中共的领导或配合下，通过多种渠道，从国民党内部开展策反工作，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或接受和平改编，为瓦解敌军，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就经常同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商讨如何利用统战关系策动国民党官兵起义。1948年1月民革成立后，更加紧了军事策反工作。1948年9月，民革中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国民党将士书》，号召国民党官兵“立志做救国救民的事业”，“毫不犹豫地脱离蒋政府，到革命委员会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告诫国民党官兵“顺人民者昌，逆人民者亡。大反乎人民意旨的独裁卖国统治，其灭亡是注定的”，“跟蒋政府走则身败名裂，跟人民走则建功立业，何去何从，宁待考虑！”1948年11月，民革中央又发表《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再次号召“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立刻行动起来”，“允宜率先起义，早的挣脱魔掌”。民革认为，策反“可以发挥特殊作用，这是我们民革与共产党合作不

可推卸的责任”。“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代新政协？何以交代联合政府？”民革还专门成立了由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龙云、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组织的军事小组，并建立秘密机构，与中共中央华南局、中原局保持联系，配合策反。民革还派遣大批干部携带李济深写给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程潜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的亲笔信，开展策反工作。

1948年11月，民盟中央发表《告蒋军官佐士兵书》，指出：“蒋政府在军事上已经完全陷于崩溃的绝境了”，号召蒋军官佐士兵“赶快放下武器，退出内战”，“或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做绝望的抵抗和完全无意义的牺牲”。农工党也派了大批得力干部回到上海、南京等地进行策反工作。

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给同自己有一定交情或联系的国民党将领写信，向他们讲清形势、劝他们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这些策反工作，有的是各民主党派单独进行的，有的是与中共组织协同进行的，取得了很大成功。

1948年秋济南战役时，民革、农工党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策动了担任国民党济南西线指挥官的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三个旅共两万余人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迅速夺取了济南。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中共通过各种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民盟华北支部负责人张东荪和农工党秘密党员、爱国将领邓宝珊则被傅作义聘为谈判代表，出城与人民解放军代表聂荣臻、罗荣桓直接谈判，对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期间，长期在国民党部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和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何基沣，率领所属国民党五十九、七十七两个军三个半师23000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民革李济深通过王葆真配合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3月，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在南京举行了起义，并向解放军提供了国民党军队江防部队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内部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解放军渡江作战非常有用。其中，农工党党员邓昊明、李君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策反工作功不可没。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十九军团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部两万多人在武昌以南贺胜桥举行起义，加速了汉口、武昌、汉阳的解放。在此过程中，民革王葆真、李世璋及湖北地方组织配合中共进行了大量工作。

1949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这次起义，民革和农工党均配合中共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具体负责这次起义活动的是李世璋。李世璋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北伐战争时在程潜的第六军工作，任政治部秘书。

1949年秋，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广东过程中，民革和农工党配合中共地下党，先后策动了国民党军队吴奇伟、李洁之、练惕生、李汉冲和傅柏翠部起义。

1949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民革、民盟都做了大量工作。时任民革川康地区负责人的刘文辉本人同时也是民盟的秘密盟员。刘文辉起义后，又推动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守珩率部三万余人于12月21日在金堂、广汉地区起义。接着，又促成了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于12月24日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地方实力派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实现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民革主席李济深、民革军事领导小组成员龙云和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都为这次起义的实现做了大量的策动工作。

1949年12月，国民党军工兵团中将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川南叙泸警备司令部司令郭汝瑰于川南宜宾率部起义，其间，民革上海临工委负责人王葆真、梁佐华做了许多工作，且一直将工作由南京（时郭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做到四川，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另外，农工党在其他许多地区，对国民党军队也积极进行了策反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功。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过程中，策动了该党秘密党员邓宝珊将军在山西榆林地区率部起义；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促成了国民党军周绍轩、范绍曾部的起义。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后，在农工党的策动或参与策动下，国民党八十九军马师恭部在芜湖举行了起义，安徽省保安司令、代理省主席方师岳在屯溪举行了起义等等。

除进行军事策反工作外，为了加速敌人在政治上的瓦解，民革还对国民党上层的高级党政官员进行了一些策反工作。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后，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均想弃暗投明，向人民靠拢。1949年6月，民革发表《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号召国民党员不应再追随蒋介石反动集团，要迷途知返，当机立断，“投到人民的队伍来，投到民主革命的阵营来”，为

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尽力。这时，在中共和民革的争取、教育和积极推动下，8月13日，黄绍肱、贺耀祖、刘斐等44人在香港联名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在中共领导下为打倒三大敌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几天以后，陈明仁等11人又在香港发表谈话，表示响应黄绍肱等人的主张。9月19日，武和轩、范予遂、黄启汉等53名立法委员宣布起义，并发表了《脱离国民党宣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发表的宣言和通电，西方各国的重要报纸都纷纷刊载，指出国民党已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在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加速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倒台。

各民主党派还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收集重要军事情报，通过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给人民解放军，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民革成员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提供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名单、军事布防图乃至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的重要内容和兵力部署，对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10月，民盟上海区执行部根据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批准上海市支部建立情报站，负责人为曹宪荪，成员有杨柳村、江波等。下面专设一个小组为中共搞情报，以一家古玩店和无线电商店为掩护，为中共收集和传送了大量情报，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民盟湖北省支部发动盟员收集了大量情报资料，送到解放区或中共地下组织。这其中就有武汉三镇国民党军警机关的情况、城防工事图以及武力配置情况等。民盟福建省支部派遣盟员打入敌人内部，收集了驻闽国民党军队的番号、战斗序列、火力配置、军事地图、机密命令等情报。民盟芜湖分部测绘了敌军江防工事网、江畔地形图，送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当时在国民党后勤部担任高级职务的民盟盟员朱静涛，也将许多重要情报及时送交中共南方局手中。

农工党有一些秘密党员，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担任着各种重要职务，在收集军事情报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48年秋，民盟南方总支部的郭翹然、曾伟派盟员李世浩、李瑚、叶志良会同农工党的钟岱（当时在广州市府工作）共同进行情报工作。他们把工作一直做到国民党南方最高军事机关里。当时，担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的是余汉谋。他曾一度哀叹：“这是怎么搞的？我们简直无法打仗。”原来，绥靖公署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绝密军事情报，

早就被他的参谋长梁世骧从参谋处作战科长何兆康那里直接获取并送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局负责人了。于是，解放军总能制敌于先机。而这个梁世骧正是农工党党员。

1946年6月，根据中共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农工党党员刘宗宽接受了原来婉拒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重庆行营”参谋处处长之职。期间由于他将情报及时送达中共方面，设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时撤离，避免了被国民党查抄的危险。大西南解放前夕，刘宗宽晋升为中将，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旋代理参谋长，大权在握。他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军队部署、指挥官特征等，向中共提供了详细情报，一有变动，便随时报告，使中共对敌情了如指掌。1949年春，刘宗宽借调整部署之机，留出空隙，为解放军进军西南创造有利条件。解放军入川后，刘宗宽受到中共西南军区嘉奖，并获“解放西南第一功”的崇高荣誉。

农工党为中共收集到的重要情报还有国防部的重要情况和作战计划，南京市的城防工事地图和南京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国民党军令部1948年后备兵力统计，毛人凤布置追踪中共领导人曾山的情报，长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况等等。

1949年，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小城市将要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政府对工矿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和一切重要设施采取的方针是能迁走的要迁走，不能迁走的在解放前夕要彻底破坏，“决不留给共产党”。而对城市中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一切进步力量，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大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等，则采取镇压和屠杀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有些城市的解放指日可待，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要发动和组织群众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1949年4月23日，汇聚北平的各民主党派发表《拥护毛主席、朱总司令进军令的联合声明》，号召“在一切解放区，全体人民必须加紧生产，服从法令，动员支前，在解放军作战之区域，及将进攻之区域，所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必须努力动员迎接解放大军，协助杀敌，并保护一切重要物资，免受破坏。”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在参加解放战争的同时，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有效地开展宣传中共政策、护厂、护

行、护校等迎接解放的一系列斗争，积极参加接管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胜利成果，稳定新生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盟上海市支部、南京支部于1948年油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还秘密出版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中共的土地政策。民盟上海市支部还组织了一个政策研究会，翻印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城市工作的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文件，并组织学习和研究。民盟苏州支部出版油印小报《光明报》，刊登解放区的广播新闻和中国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及重要文告。民盟广东省中山县支部创办了《群声》通讯，向盟员介绍解放区情况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民盟西康支部的《光明》旬刊、民盟重庆市支部的《反攻》等刊物也都积极进行政策宣传，他们还联合其他民主党派的一些成员在川康银行地下室收听解放军的广播，然后进行宣传。

当时在国民党谣言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城市都有些资本家准备将企业迁走，转移资金物资去南方或海外。针对这种情况，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在北京发表了广播演讲，宣传解放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号召上海和大城市的工商业家留下来迎接解放。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的民建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动员他们不要听信谣言，消除他们的疑惧心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民进总部为迎接解放，指示上海分会配合当地中共地下组织积极争取文化界、工商界及自由职业者各阶层的群众，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1949年4月20日，马叙伦还以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的身份，通过新华社向上海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希望上海各阶层人民迅速团结起来，协助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

农工党上海市支部大量翻印《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城市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发给党员学习宣传，并包装起来派人寄给著名工商业者和各界人士。1948年2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一）大力开展城市的组织工作和民主活动。（二）掌握地方人民武装。（三）策反国民党军起义。（四）扩大宣传，安定人心，保护一切地方公物、资产、财物。（五）组织城乡人民迎接解放军。指示下达后，各地组织积极行动，尤其是江南各省市的各级组织，普遍开展了“四个三”活动，即“三护”（护厂、护仓、护校）、“三保”（保产、保资、保物）、“三支”（发动群众出劳力、筹粮草、送鞋伞）、“三劝”

（劝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劝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去台湾、劝一些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民盟上海区执行部发动上海申纺十二厂、浦东恒大纱厂的盟员和广大工人一起，保护工厂设备、原材料和成品不受损害。民盟湖北省支部发动在建设厅和交通运输机关工作的盟员，在省政府行将逃跑时拖延搬迁，保护了档案、器材和交通工具。民盟湖南省支部发动第一监狱的盟员，和群众一起，保护了第一监狱的印刷厂和缝纫机厂。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民盟南京总部拟定了《迎接解放的工作计划要点十四条》，号召盟员坚守岗位，保护资产及机关档案，防止敌人破坏；于南京解放前夜，编印欢迎人民解放军、告南京人民书六万余份，标语数千张，广为散发，和南京人民一道迎接解放。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面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和国民党贪污腐败，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共产党和人民革命一边。1948年10月，在南京召开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方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孙越崎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1949年5月，其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保护了大量稀有矿产，得到毛泽东的复电嘉勉。

民联南京分会向中共提供了特务组织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和国民党部队驻地、番号、特工电台分布等情况；机智地保护了全市户籍档案和户籍卡的完整无损；并动员了旧警人员在南京解放时，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九三学社常务理事梁希和潘菽领导成立了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拒绝迁校，号召同学继续上课，同时组织师生员工日夜守卫图书馆、实验室等重要部门。

1949年5月25日，上海还有残敌顽抗，时任民建理事会理事的胡厥文即通知何萼梅、朱德禽同志，把已预备好的《欢迎解放军宣言》设法发表，号召上



海市民勇敢地站起来，协助解放军做接收接管上海的十项重要工作。并要求上海工商业企业家们依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维持和恢复生产，协助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民建上海分会负责人、民盟上海执委黄竞武和民盟成员吴藻溪等积极开展工作，专门调查了国民党四行两局的组织、业务和人事情况，并发动银行职工罢工拒运金银去台湾。

民建重庆支部则通过聚餐会联系和稳定了天录皮鞋厂经理徐山、路易皮鞋公司经理黄次乾、沙市纱厂经理潘迎山、总工程师毛翼丰、重庆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吴锡瀛、福农麦粉公司经理李仲平、中美公司经理周焕章等。临解放时，重庆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吴锡瀛在民建重庆分会协助下，将全家移驻大溪沟重庆发电厂内，把职工组织起来，保护了电厂的安全。

根据胡厥文的指示，民建武汉分会积极协助武汉地下党展开工作。他们利用武汉工商界原有的“星期六聚餐会”的活动形式，宣传中共工商政策，动员武汉工商界人士留下不走，不拆迁机器，维持好生产。他们还与工商界人士研究应付国民党强行拆迁甚至破坏机器的对策。除申新纱厂的少量发电能力外，承担武汉水电供应的是全部由宋子文官僚资本主办的既济水电公司。为防止敌人逃跑前破坏，民建成员华煜卿受中共地下党委托，利用同乡和朋友关系成功地做好了既济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保基的工作，孙不但不随国民党逃走，而且还留下来保护了工厂的机器设备，保护了武汉三镇的水电供应。华煜卿等民建会员还利用社会关系配合中共地下党争取了伪资源委员会煤矿总局汉口供应处处长盛希康和武汉市电信局局长尤其绍的配合，从而完整地保存了这些单位的设备和器材，使得武汉燃料正常供应，电讯畅通无阻。

农工党华东局为了保护资财，专门成立了由连瑞琦、万芸等人组成的工商小组，把护厂斗争作为当时的一项中心工作来进行。在上海，他们印发了大量《工人怎样迎接胜利》的小册子，广泛发送到有农工党组织的各工厂中，明确提出“护厂第一”，“工人不离机器”，“为迎接解放而努力”。农工党上海市委与国民党军队后勤部上海被服总厂的农工党总支部联合行动，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密切配合，把国民党强行拆卸的机器设备从码头拦截回厂，使这个拥有一万五千余职工的大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中国农业银行福建分行副经理的职务为掩护，农工党福建地下组织派员在国民党四行两局，建立了秘密护行队，

清点、查抄、登记所有财产，包括库存的黄金和银元。经过紧张的斗争，这批财富被保存下来。

各大城市高等学校中的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迁校、反破坏斗争，取得很大成绩，高等院校几乎都被保存下来。

从 1949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0 日，北平的经济界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先后举行七次座谈会，就接管大城市等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与会者有千家驹、沙千里、何惧、章乃器、施复亮、胡子婴、赖亚力、朱学范、黄炎培、盛丕华、盛康年、张炯伯、包达三、吴羹梅等。先后在各次座谈会上报告的人及内容有：千家驹作《贸易问题的报告》，吴羹梅作《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盛康年、朱学范分别作《商业问题》和《劳资关系问题》的报告，盛丕华、吴承禧分别作《关于房地问题》和《中小工厂开业问题》的报告。

中共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在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为发挥各民主党派在接管工作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曾与已到达北平的上海民建及会工商界人士进行商谈，并决定聘请他们参加接管工作。中共中央还于 1949 年 6 月 1 日就聘请民主党派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问题，电讯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临行前的 21 日那天，周恩来、李维汉、陈云三人具名邀请了黄炎培等民建及工商界被聘人员进行座谈。在中南海欢宴席上，周恩来谈了中共的希望，并嘱早归。黄等当天下午乘车南下，6 月 25 日“在大群欢迎狂潮中到上海”。他们到达的当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决定聘请黄炎培等拾肆人为上海市府顾问给华东局电》，指出：“现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已赴沪，如你们无其他严重困难，请即将上述八人再加上原已在沪之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及将由港到沪的章士钊共十四人一律聘为顾问。”目的是“俾其能因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因此，“望你们吸引其参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还指出：“此十四人，均将参加新政协，约在上海留一个月，即需北上”。所以要组织他们抓紧工作，对他们的各种困难，“望给予帮助”。电文特别指出：“黄炎培葬子（黄竞武）、陈叔通葬兄，望给予帮助。”“马寅初将赴杭州”，望“予以照料，并助移家北上。”黄炎培等到达上海后，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等设宴招待。

其后，黄炎培等参加了华东局统战部会议，商讨了粮食问题、劳资问题、失业问题、公用事业问题、各地征粮问题等等。他们还听取了潘汉年、许涤新报告诸问题的现状及处理办法，并提出具体建议。黄炎培等还组织在上海的民建会和职教社成员贡献意见、参加工作，广泛动员上海工商界迅速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奔走于资本家之间，向资本家宣传中共工商政策，动员资本家开工生产，为稳定社会秩序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区急需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渠道，向解放区或游击队输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民盟上海市支部先后三批输送盟内外青年 100 多人去浙东解放区参加革命；民盟北平市支部在北平解放前，动员和组织了近 200 名盟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去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民盟西北总支部、云南省支部、江西省支部都动员了大批盟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到解放区或游击区参加革命。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向浙东解放区输送了上海青年 170 多人，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约 50 人，其中包括教授、记者、音乐家等。同时，各民主党派积极从物资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量枪械弹药、药品等物资输送到解放区或直接交给解放军。如民盟安徽安庆支部动员 1200 多只民船，支援解放军渡江；在江西赣北地区，为配合解放军作战，农工党地方组织修桥保桥 14 座，支援杉木 3582 根、石灰 575 担、军粮 250 万公斤、柴草 225 万公斤，此外还有大量蔬菜、军鞋、担架和木船。

民主党派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民主党派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据 1949 年 10 月的不完全统计，在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民革的周均时、王伯与、李宗煌、孟士衡、曹立中等数十人，民盟的杨伯恺、于邦齐、王伯高、何雪松、张国雄等一百多人，农工党的曾伟、虞健、刘启纶、黎又霖等一百余名党员，因从事地下工作或军事活动而献出了宝贵生命，与共产党人的血流在了一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种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大大加深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

各民主党派人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对此，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多次强调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12】驳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在反对美国在中国侵略行径的斗争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民主党派反美起因是 1946 年底的“沈崇事件”，核心是反对美军的暴行和美国政府的侵华政策。

第二阶段，各民主党派反美缘起于 1947 年底至 1948 年初美蒋《救济协定》与《海军协定》的签订，核心是反对美国的援蒋政策和扶日政策。

第三阶段，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中共发起的对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批判，此次缘起于 1949 年 8 月美国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核心是彻底揭露美国在华的反动本质。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 1944—1949 年时期》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发表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美国对中国的友谊”，白皮书一方面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援蒋的失败；另一方面，却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控制”。这样的白皮书，实际上就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同时也是美帝侵华罪行的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是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

毛泽东深知，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在一部分人心中还存在着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为了揭露美帝侵华政策的反动实质，教育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 8 月 12 日至 9 月 16 日，连续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六篇评论，其中五篇出自毛泽东之手。这些文章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

略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和教育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阐明了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和必然胜利的原因。

各民主党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讨论和批判中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共识。民革在《严斥白皮书》中指出，美国白皮书是一篇不打自招的供状。它供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图将世界历史标为“美国世纪”，“全世界都应该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市场和殖民地”，中国不仅“应该而且当然是属于华尔街金融寡头所有的”。要使美国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只有准备同它斗争，把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8月23日，民盟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指出，我们读了白皮书后，“只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美国过去一百年来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最近五年来更变本加厉地侵略，今天又正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本白皮书，使中国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卖唱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还有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唤醒。”“我们相信，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必能站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来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文章深刻驳斥了美帝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诬蔑，指出：“倘认新民主主义有外来的思想成分，即视此为外来制度，那么落伍的旧民主主义更是帝国主义向中国的输入品。思想是没有疆界的。只要是进步的思想，只要是有利人民的制度，中国人民当然愿意接受。”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奇逊函中所谓鼓励‘民主个人主义者’来推翻‘外来制度’，这就是另找奴才，以华乱华的阴谋。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在中国依然是旧民主主义的输入品。”

8月24日，民建以发言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严正指出：“白皮书上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好梦是做不成的”。如果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做好对象，那美帝又将多犯一些错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经过考验，比较纯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某些程度的斗争”。在斗争中“它也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从绝望中复苏过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本或

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对于整个世界和新中国的方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应该也不会认错的。”民建的这一声明，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阐明了民建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于8月24、26日两次致函黄炎培，盛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这个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即有利于今后的合作。”其他民主党派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开展了对白皮书的批判。

民主党派对白皮书的批判，彻底揭露了美帝的侵略本质，肃清了民主阵营内部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批评和教育了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从而更加坚定了与中共合作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顺利召开新政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民主党派反美运动三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选择，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各民主党派通过自我教育的不断深入，逐渐认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从而真正放弃对美的幻想，并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当中。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13】召开新政协时机已经成熟

### 导读

1949年9月21日，历经三个多月筹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政府中，张澜、宋庆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郭沫若、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副总理；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中，民主人士占了45名……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

1949年，一个旧的时代已为历史车轮所碾碎；从今往后，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北上到达解放区后，讨论召开新政协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迎接新政协》一文中强调，要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做好准备，重要的工作在于“扩大新政协的宣传”，要使全国人民对新政协都“有所了解、有所要求、有所建议”。

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等民主人士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草案内容包括：（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问题。（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问题。（三）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四）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应讨论的事项问题。10月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东北局李富春等人，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



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等七人商榷。并嘱咐：“他们如有不明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他们如愿参观各地建设或访问他们友好及我党负责人员，应尽量予以招待和便利。”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就参加新政协名单问题，指示李富春等征询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意见，并要求他们在向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声明：中共所提出的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增减和改动。对蔡廷锴，电报中特意写了一句：我们对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不熟悉，请他提名单，至于蔡本人是以代表民革为宜还是代表民促为宜，亦请他自己定。10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等约请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等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及新政协参加者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两次座谈。

关于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公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认为这实质是一个革命领导权问题。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民革提出：“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革命“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民盟致函毛泽东，“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致公党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认为，共产党是新政协“当然的领导者”。可以说，从抗战胜利到旧政协，再到新政协，民主党派从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到最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比较、鉴别、选择的过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英勇卓绝的斗争中，在与民主党派并肩战斗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关于新政协的性质问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均认为，新政协和旧政协有三大区别：一是成分不同。旧政协包括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及其代理人国民党独裁派；新政协则以工农为主体，把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排斥到政协之外。二是指导思想不同。旧政协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新政协则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三是任务不同。旧政协是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谋求妥协，希望以协商方式取得和平和民主；新政协则是革命工农阶级与一切爱国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协商，是长期以来和衷共济、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必然结果。

关于新政协的内容。民进提出了一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建议新政权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必须有“无产阶级及其党的领导”；政权形式“均采用委员会制，其委员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军事上“民主联合政府应以人民解放军为基础，组织国军，为国防及联合政府之有效施政之保障”；外交政策则“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切军事扩张、经济侵略、政治干涉”。农工党建议，人民的新政权是“以最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为中心，实行进步的新民主主义”；“充分保障人民个人自由权利和集体权利”，由新政权没收官僚独占资本为国家建设资本，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倡导农业合作，并普遍提高人民文化程度，保障人人受教育的权利。民盟建议，新政协制定共同施政纲领，必须遵循“三个前提”和“五项原则”，即代表各革命阶级利益的前提，彻底消灭共同的敌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前提，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前提；确认新民主主义为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临时联合政府的最高施政原则，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为经济纲领的最高原则，人民解放军是民主联合政府军队的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及文化教育的原则，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的原则。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吴晗认为，等到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再考虑不迟。新政协的地点，有人建议在石家庄召开，陈叔通力主待北平解放之后，确定为首都，再召开较好。关于如何解放北平，符定一建议，先攻克北平门户天津，则北平可不攻而破，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甲）关于新政协筹备会者：（1）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2）筹备会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集新政协的正式会议。（3）筹备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审阅同意后由筹备会正式通过。（4）一般的决议，经过多数通过，全体负责实施；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少数单

位有不同意见仍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5) 筹备会的地点预定为哈尔滨。

(乙) 关于新政协者：(1) 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2) 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共计 38 个单位组成。(3) 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定在 1949 年。(4) 新政协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

(丙) 关于专门委员会者：不论筹备会或召开新政协，均可按工作需要聘请若干民主人士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共同协议的达成，使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召开新政协等问题进一步达成了共识，为新政协的召开提供了政策基础。

1948 年 11 月 2 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1949 年 1 月 10 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 5 个兵团部，22 个军部，56 个师，共 55.5 万人。1 月 14 日，解放军攻陷天津；16 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北平守军司令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21 日，双方正式达成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随后，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其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了协议条文，古都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2 月 1 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 56 人，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表示愿意追随中共，加紧团结，为实现最后的胜利和中国的建设奋斗到底。电文说：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作战以来，已二年有半矣。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击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匪，虽若逋逃；助恶美帝，犹弄鬼蜮，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

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可潜藏；纵有狼狠羊贪，令阴谋断难实现。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这篇电文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即电复 56 位民主人士。

2 月 3 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的盛大仪式，受到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古老的北平城鲜花遍地，锣鼓喧天，挣脱国民党统治的人民箪食壶浆迎于道途，人民解放军秩序井然，秋毫无犯。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千年古都迎来了新生，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也为新政协的召开，提供了一个更宽阔的舞台。

2 月 25 日，先后自国民党统治区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 35 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崇民的陪同下，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于中午 12 时由沈阳抵达北平。这些民主人士包括：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沈钧儒、李文宜、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郭沫若、彭泽民、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谭平山、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庐、洪深、胡子婴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张奚若、胡愈之、周建人、费孝通等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共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天津市民主人士李烛尘、资耀华、张国藩、刘持钧等 40 人也于同日下午两点乘车抵达北平。一时间，古老的北平城群贤毕至，焕发出蓬勃生机。

次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石家庄来平及留平的各民主人士、各团体的代表。计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等 8 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等 8 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 4 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等 4 人，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等 5 人，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 5 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等 3 人，中国致公党陈其尤，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全国总工会李立三等 12 人，农民代表刘宗岩等 4 人，全国青联代表冯文彬等 4 人，全国妇联代表沈兹九，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罗叔章等 2 人，全国学联黄振声等 2 人，天津学生代表吴隆之等 2 人，文化界茅盾等 15 人，教授张奚若等 18 人，产业界李烛尘、陈其瑗等 7 人，以及少数民族代表乌兰夫。另外，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到北平访问的

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国民党方面的“四老”也应邀参加。与会主宾共 140 人。叶剑英主持了欢迎大会，林彪、彭真致欢迎辞，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李德全、周建人、朱学范、朱俊欣、章乃器、张奚若、许德珩等 14 人发表了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 28 年来领导的中国革命表示敬意，对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表示祝贺，并表示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是夜，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春意盎然，民主人士怀着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美好愿望，与中共代表举杯畅饮，共同展望新中国的美好前景。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的顺利结束，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已是一项紧迫任务。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 34 人；候补中央委员有：陈绍敏、王首道、邓颖超、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等共 19 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 20 人，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等 12 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在革命形势积极推进的情况下，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谈判的时间拟

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毛泽东说，从 1927 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即将诞生的政权性质和阶级基础作了分析，并说明了统一战线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毛泽东希望全党同志警惕胜利后的骄傲自满情绪。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为新政协和《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前往解放不久的北平古都，25日凌晨6点抵达。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五一口号”·记忆 14】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败亡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以“和谈”为名，企图“划江而治”，调整力量，伺机反扑。为此，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李宗仁任代总统，并派遣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为揭穿国民党当局“划江而治”的阴谋，也为了尽量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毛泽东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意孤行，谈判最终失败。

随后，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于4月20日发起渡江战役，所向披靡，23日深夜一举占领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乘胜追击，合围歼灭了芜湖、南京、镇江逃敌，攻占金融中心上海，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并向福建及华南、西南挺进。渡江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成为泡影。加之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三年来的穷兵黩武，使国统区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已经失去对国民党的信任，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彻底破了产。

此时，召开一个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描绘新中国的蓝图，条件已经具备。

1949年6月11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协商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组成，即（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民主建国会；（5）无党派民主人士；（6）中国民主促进会；（7）中国农工民主党；（8）中国人民救国会；（9）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0）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1）中国致公党；（12）中国人民解放军；（13）中华全国总



工会；（14）解放区农民团体；（15）产业界民主人士；（16）文化界民主人士；（17）民主教授；（18）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19）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21）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22）国内少数民族；（23）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同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自上述 23 个单位的 134 位代表与会，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毛泽东以诗人的情怀，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人民的命运一经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号召大家团结一起，各尽其能，为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到底。他还说：“筹备会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全国人民都引颈等待着美丽的结果，我们要更加振奋精神，认真地、严肃地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

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发言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是表明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基本上摧毁了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统治，革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新政协是“一种人民的大协商会议”，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套“完全合于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联合政府组织大纲的草案来，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迅速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中国人民统一民主共和国。”

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也先后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努力完成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使命。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修改并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等 21 人为常务委员。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

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设立6个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工作。第一小组，主要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组长李维汉；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第四小组，拟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绍先；第六小组，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自此，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共同纲领》是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为此，新政协筹备会专门成立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任组长。

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中指出：“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委托中共负责起草。从6月22日起，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连续一周没日没夜起草《共同纲领》。6月30日，初稿顺利完成。

《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而奋斗。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同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它凝聚了共产党人关于建国后政权问题的深入思考，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成为《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指导思想。

随后，周恩来又主持或出席了多次会议，专门研究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经过充分听取意见，

反复修改，共同纲领交由毛泽东审定。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的修改计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和9月13日共五稿。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要求：“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目应是《共同纲领》。”在9月11日稿上批示：“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但不要拆版，候起草小组修改后，再印一千份。”还有一张便条上写：“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9月22日，周恩来在会上代表新政协筹委会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着重明确了两点：

一是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将长期存在。周恩来说，关于这个问题“在讨论中曾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这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主要政策问题上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面前，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二是在《共同纲领》中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前途。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通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而在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的革命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定了我国的外交、民族、文化教育和人民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新中国宪法颁布之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的起草，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

协商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根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不允许参加。”这就要求新政协既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要充分照顾各方面，又要防止一切反动党派、反动势力混入，以保持政协阵容的严肃性。

1949年6月19日，筹备会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为45个，代表总名额为510名。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得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此外，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人选，均由筹备会常委会决定。

根据筹委会的规定，第一小组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其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做了很多沟通协调工作。从代表名单看，新政协最终确定的名单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是具有极强的广泛性。新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各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物。

筹委会设立了“特别邀请人士”类别。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前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前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前海军宿将萨镇冰，老同盟会员张难先，长期在老解放区工作的陈瑾昆，著名艺术家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燕京大学校长

陆志伟，商务印书馆老板、前清翰林张元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都在邀请之列。

国民党方面，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以及和谈代表邵力子、黄绍肱、刘斐、李蒸；有为国共和谈而来到解放区的“四老”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等人。

筹委会专门设定了“无党派民主人士”派别，专门吸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主党派，但对民主革命有重大贡献，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郭沫若、马寅初等人。周恩来说，他们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先后恢复和建立。1948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恢复；1949年3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3月底4月初，首次全国妇女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5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随后，全国自然科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代表也分别举行会议，成立相关的全国性组织的筹备委员会。这些全国性的人民团体，都参加了新政协。

尚未解放的地区，新政协专门为其预留了十分之一的代表名额。

据说，新政协名单所列单位中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的一些满族人因此而哭了（实际代表中，如齐燕铭、罗常培是满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弥补。

二是具有严格的政治标准。这尤其体现在对一些党派的严格把关上。对申请参加新政协的党派，筹委会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对于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不能以党派或团体单位的名义参加。同时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经过严格把关和充分酝酿，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和民革、民盟等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之外，明确规定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党派和团体。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一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重庆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由于处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直到1949年1月才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筹委会认为，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应邀请其参加新政协。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之后，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人士，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于1948年5月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口号”。筹委会认为，台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已经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应邀请参加。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前身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筹委会同意其参加。

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曾有不少其他党派团体要求参加政协。筹备会共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申请28件，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工党、光复会、中国农工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筹备会经过调查，坚持原则和标准，做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对于不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的组织，不考虑他们参加政协，要求他们宣告解散结束组织，但邀请他们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对这些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予学习与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向有关民主党派推荐。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性质与民革相近，主张联共反蒋，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于1949年8月在上海宣告解散，其成员大都转入民革，领导人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民社党革新派成分复杂，其领导人沙彦凯、汪世民以个人身份加入新政协，并在会议期间宣布民社党革新派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自动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盟。中国农工党主席董进时，1949年5月宣布该党停止活动。中国少年劳动党1949年9月正式发表解散公告。国民党CC分子操控的中国民治党，以及为国民党所利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政党”，因其并未参加民主运动，有的还属反动组织，被要求解散。“汉留”等封建帮会性质组织，被勒令解散。

新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当时的形势下，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和民革、民盟这两个党派采取了相等名额。而在人民解放区、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单位中，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占多数。这样，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又促进中共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反复沟通、统一思想，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共有45个单位，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三个党派的正式名额均为16人，候补代表2人。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26%，民主党派约占30%。这份名单，囊括了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精英。据说接到这份名单时，毛泽东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

新中国的国歌、国徽、国旗、国都和纪年等方案，由新政协筹委会第六小组负责草拟。著名教育家、民进领导人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在经筹委会批准的前提下，第六小组提出《关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方案）》，面向全国人民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并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截至8月20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国旗方案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方案112件，图案900副；国歌方案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意见书24封。

经过充分讨论、认真评选，评选委员会在国都问题上达成一致，都建议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在纪年上，也多倾向于公元纪年。但在国歌、国徽、国旗上，仍存在分歧。为慎重起见，9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9月22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念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

关于国歌，征稿虽多，但一时却难以选定。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但有人提议修改歌词。周恩来插话：“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接着说：“我国人民经过

艰苦奋斗，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确定了下来。

讨论较多的是国旗方案。在第六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有四种主要意见：一，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但有模仿苏联之感；二，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不合作国旗图案；三，两色或三色横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横条象征长江、黄河和珠江，镰刀锤头象征工农等各阶级联合，但图案也较复杂，且有美国、苏联国旗混杂之感；四，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几种方案，都各有利弊，评选委员会和专家反复商议，从中选择了 32 幅，交审查委员会决定。

在 9 月 23 日审查委员会讨论时，大家比较倾向于复字 32 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位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工设计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争论较为激烈。在 25 日的讨论中，毛泽东建议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拿着放大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一直关心国旗方案的华侨代表陈嘉庚接着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同意毛主席讲的复字 32 号国旗方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表示赞同：“我觉得 32 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相继发言，五星红旗的方案最终得到通过。

关于国徽，鉴于大家对当时所涉及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毛泽东建议：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纪年，大多数人赞同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炎培接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一样！”于是，公元纪年得以确立。

国号的讨论最为激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几次在中共党内文件中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自从1948年8月1日电复香港民主人士直至筹备会召开，政协有关文件中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筹备会上，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基本达成一致，同意后者。

1949年9月21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充分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这是一次肩负着建国使命的时代盛会。参加盛会的代表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共662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有著名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有爱国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有文化名人梅兰芳、程砚秋；有原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主席团轮流主持。第一天的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在大会上致词：“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

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从9月21日到30日，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参加新政协的人士进行了大会发言。

民革代表何香凝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对内实现国家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和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孙先生了！”李济深说：“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郑重表示，我们对于人民政协向大会提出的原草案，完全赞同。”“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证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民盟代表张澜发言：“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也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人民又确实确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践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提高发挥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发言中把中国比喻成为一所新建的大厦，他说：“这一所大厦，是钢筋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这钢筋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厦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厦屋顶的旗帜就是“新民主主义”。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就是“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这所大厦的主人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这一比喻，贴切而形象地揭示出新中国的政权基础、领导力量、

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结下的深厚友谊，将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发扬光大！

民进代表马叙伦说：“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鼓励私人资本，即海外华侨与国家资本有计划地合作，发展工业。”

“在思想方面，我们更应当注意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要是不把英美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加以澄清，这种思想就会残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广大地推行这种教育。”

农工党代表彭泽民在发言中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共同纲领是中共最低的纲领，是要一字一句对中国人民负责，使其彻底实现的。相信中共有此诚意，有此决心并有力，使这建国纲领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兑现。第二，完全承认政治协商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好的保证。第三，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的国家制度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民主集中的人民自己负责的政权。在本质上与欧美三权分立的旧民主的国家制度，绝无相同之点。”

致公党代表陈其尤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虽然还不是直接经过人民普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不仅都来自民间而且都是多年与反动派作过残酷斗争的人，所以都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在全国代表大会未召开之前，人民政协会议及其所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可以充分代表人民行使行政权的。”

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人物，是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 1925 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 92 岁的老翁，也有 21 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华侨，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大家“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

台盟代表谢雪红发言表示：“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支持这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这个共同纲领中的每一条都代表我们的利益，为着这个纲领的全部实现，必须努力到底。”

民促代表蔡廷锴、民联代表陈铭枢、救国会代表沙千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等也在一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在发言中充分表达了对新中国前景的美好展望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任，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好新中国。

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29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委员和国务院组成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了半壁江山。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等。其中民主人士26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占60%。

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如担任正职的民主人士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希，政务院及所属单位机构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

司法部部长史良（女），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女），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此，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总结，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民主党派已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或“不合法团体”，而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重任的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革命征程中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今，他们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新篇章！（完）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7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是我国政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

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点，精辟论述了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并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如何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提出了要求。

70年来，得益于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民革自身建设突飞猛进，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革不断提高履职能力，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共十八大以来，民革聚焦国计民生重大课题建言献策，多次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民革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走过的70年，加深了我们对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重大意义的认识，充分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土壤中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民革全党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为契机，坚定不移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准确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基本要求，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凝聚思想共识，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提高“五种能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投身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不辜负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重托，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新路：从“五一口号”到新型政党制度

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礼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肇端。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新型政党制度，标志着这一制度臻于成熟，走出了中国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重温多党合作辉煌历程，对于民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把握新型政党制度内涵，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具有重大意义。

回顾“五一口号”发布前后历史，深刻认识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初心。对“五一口号”的响应，标志着民盟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民盟前辈在探求救国之道上屡遭挫折后的自觉选择、理性选择。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能清楚发现，我国政党制度初建时就确定了两个基点：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团结奋斗。这就是这一制度建立的初心。

回顾70年多党合作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深刻认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丰富内涵。从“八字方针”、“十六字方针”到“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从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发展完善，首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与时俱进。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治发展贡献了新模式、提供了新方案。制度中的协商精神与合作共赢精神也贯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中国方案”有助于解决世界问题，这是我们的底气与自信。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民盟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五一口号”



体现的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奋斗精神坚持发扬好，提升自身建设水平，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共襄复兴伟业。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传承优良传统 续写多党合作新篇章

民建中央主席 郝明金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五一口号”顺应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指明了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愿，开启了我国发展人民民主的新进程，为形成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响应“五一口号”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1948年5月23日，民建在上海通过了赞成“五一口号”的决议，作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选择。70年来，民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一路同行，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风雨历程，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作出的正确选择，将成为民建永远的坚持；社会主义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继续坚持、发展和完善好这一新型政党制度。

70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努力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深化政治交接，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开展好“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充分

发挥民建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不忘初心 持正行远

民进中央主席 蔡达峰

7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揭开了新中国建立的序幕，谱写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光辉诗篇。今天，我们重温历史、不忘初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一口号”的强大感召力，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历史作用和坚强领导地位，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诚如《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所称，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人民奋斗的先锋集团”。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内涵，准确理解民主政治之于国家、政党和个人的意义和作用。

“五一口号”的强大感召力，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重大作用，充分体现了民主党派长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深厚感情和合作初心。为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愿望，民进始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指导下，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在严酷的斗争中坚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政治信念。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程和作用，深刻理解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初心”，深刻理解“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历史意义和时代要求。

“五一口号”的强大感召力，充分证明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相结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财富。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自身建设要有新面貌，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牢记合作初心 继续砥砺前行

农工党中央主席 陈竺

7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群起响应、挚诚拥护，走上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政治道路，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系统阐述新型政党制度，为推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930年，邓演达烈士创立农工党时就提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深深嵌入农工党政治基因中。农工党探索救亡图存的尝试屡遭挫折，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深陷迷茫的农工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要革命必须同共产党合作”，迅即确立“抗日联共反蒋”方针。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农工党坚决响应，由此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洪流。

正是经历了坎坷失败和血与火的考验，农工党才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根本扭转中华民族不断衰败的命运。自觉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是农工党的正确抉择。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历经70年不断发展、日臻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旺盛生命力的生动缩影，是“四个自信”的生动诠释！

行动是最好的传承。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在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聚焦国家改革发展中心任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前瞻、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以执政党为师，全面加

强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巩固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不忘合作初心 牢记侨海报国

致公党中央主席 万 钢

致公党是我国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中，深切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7年4月，致公党三大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后的第二天，致公党副主席陈其尤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5月5日，致公党与其他党派联合通电响应“五一口号”。同时，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回顾历史，我们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今年全国政协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提出了新的要求，致公党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一、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致公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开展学习新思想、掌握新理论、聚焦新目标，努力引导全体成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确保致公党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坚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迟疑。致公党将不忘合作初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围绕中共十九大作出的决策部署，聚焦打赢“三大攻坚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任务，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三、发挥新时代侨海报国优势的特色不含糊。致公党作为联系海外华人华侨的参政党，将最大限度地要把广大归侨、侨眷、留学人员和海外侨胞团结起来，



最大限度地把他们促进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努力把侨海的无限智慧和磅礴力量汇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最大同心圆的伟大实践之中。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坚守合作初心 同舟共济远航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武维华

今天，我们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对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不忘来路，方能致远。1948年“五一口号”的发布，为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70年历史证明，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最广泛、最有效的人民民主，同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济。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九三学社在《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标志着九三学社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九三学社将一如既往地坚守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续写新华章。

不忘根本，方有作为。1949年春，毛泽东在宴请九三学社的朋友时说，“我和各位都是新中国的‘长工’，我们的主人是谁呢？不是地主老财或资本家，而是人民，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民主党派根基也在人民，我们要关注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现象给予反映和监督，并就如何消除这些现象提出建议，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推进人民福祉。

七秩风雨，而今重行。当前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关键要做到：一是与党同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二是履责尽心，发挥自身特点优势，聚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三是治社用心，切实加强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航掌舵下，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多党合作这艘航船必将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上下同心者胜 风雨同舟者兴

台盟中央主席 苏 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发布如一声春雷，催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萌生，拉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序幕，也为新生的台盟照亮了前进的方向。5月7日，台盟迅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广大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70年来，在“五一口号”精神的指引下，台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脚踏实地地向着建设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参政党的目标不断迈进。

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新型政党制度，这是对70年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实践成果的巨大肯定，展现了对中国道路的无比自信，彰显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风范！

回顾70载岁月，我们深深体会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新时代推进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台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的合作初心。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将台盟前辈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不断提高履职本领，切实担负起“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历史重托；就是要团结带领全体盟员及所联系的广大台胞，充分发挥亲情乡情优势，尽最大努力团结岛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上下同心者胜，风雨同舟者兴。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凝聚了多少代国人夙愿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圆满实现！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 不忘多党合作初心 牢记复兴中华使命

无党派人士 包信和

在“五一口号”发布 70 周年之际，我们重温风雨同舟的光辉历史，展望共创伟业的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凡益之道，与时偕行。70 年来，无党派人士以真诚的意愿和满怀的信心，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历程中，书写了华彩篇章。今后，我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能变，与党同心同德的政治信仰不能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在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上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商以求同，协以成事。中国以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建设和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新时代为无党派人士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广阔舞台。我们要紧扣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聚焦国家中心任务，坚持道实情、建良言，做到会协商、善议政，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部署，彰显履职尽责新作为。郭沫若、程思远、袁隆平等老一辈无党派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用智慧和汗水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新一代无党派人士要学习传承“爱国报国、追求进步、敬业为民、淡泊名利、团结合作、自我砥砺”的优良传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认真履职尽责，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今年是我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 60 周年。红专并进一甲子，科教报国六十年。我将在校党委领导下，履行好校长职责，团结全校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真理、传播真知，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党派人士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不懈努力！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29）

审    稿：喻芒清 刘国华

编    辑：张地珂

印    发：各分党委、党总支部

网上查阅：<http://xcb.cug.edu.cn/info/1012/1352.htm>